

[美] 大卫·斯坦纳德 著  
冯 钢 关 颖 译



# 退缩的历史

—论弗洛伊德及  
心理史学的破产

SHI

3

INSINU

# 退缩的历史

——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

〔美〕大卫·斯坦纳德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SHRINKING HISTORY

On Freud and the Failure  
of Psychohistory

by

David E. Stann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1982

## 退缩的历史

——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

〔美〕大卫·斯坦纳德 著

冯钢 关颖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温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375 插页1 字数11.2万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200

ISBN 7-213-00345-3

K·78 定价：2.10元

我非得相信每一种谬论？倘若不是，  
为何又偏偏是这一种？世上没有再  
比理性更高的法庭可上诉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幻想之未来》

## 译 序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大卫·斯坦纳德教授这本《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是近年来对心理历史学进行系统批判的一部力作。其篇幅虽不大，但影响却不小，曾被誉为是“敲响了心理史学丧钟”的著作。

心理史学是本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史学理论，它旨在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1958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L·郎格便号召其会员把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视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他断言，“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随后，心理史学便在史学领域中风行一时。70年代，这种时髦达到全盛时期，大量心理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其中包括艾里克

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弗兰克·曼努埃尔对牛顿的研究；多丽丝·卡恩斯对约翰逊的研究；彼得·洛温贝格对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研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研究以及许多人对希特勒的分析研究。还有一些研究直接把当代的重要人物作为对象，如研究尼克松、毛泽东等等。

心理史学热衷于传记研究的倾向，或许与弗洛伊德对利奥纳多·达·芬奇的传记研究有关。弗洛伊德的《利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至今仍被视为心理史学的杰出范例，而且，“就弗洛伊德而言，这部关于利奥纳多的专题著作不仅是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跋涉”（引自《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的“编者按语”）。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以往有关利奥纳多传记中的一些极为零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没有父亲的童年时代，对母亲的感情依恋，一生中无恋爱记载，喜爱漂亮的男性学生，不厌其烦地记录开支帐目，尤其是他对童年的回忆。通过分析，弗洛伊德断言：利奥纳多·达·芬奇有同性恋情感。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男孩自幼便有“恋母情结”或称“欧狄浦斯情结”。这是所谓幼儿性欲的表现。然而通常情况下，由于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存

在，所以他会迫使儿子把这种性欲转移到其他异性身上，强制儿子作出正确的对象选择以保证性欲朝着符合社会文化要求的方向正常发展。但如若处理不当或根本没有父亲，那就可能使男孩的这种恋母情结发展成自己以母亲自居，象母亲爱自己那样，去爱其他的男孩，这就变为成年后的同性恋。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的情况正属后一类。芬奇是他父亲与他生母的私生子，自幼与母亲一起生活，父亲则与继母一起生活。这种境况加剧了达·芬奇与母亲的依恋之情。芬奇后来对自己学生的爱抚，以及记录他为学生开支的帐目等都说明他以母亲自居，在他对学生的爱中体现了母亲对儿子的爱。当然，达·芬奇的这种同性恋情感是被压抑着的，而被压抑的心理驱力则又迫使他将其升华为艺术创造力，“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产物”。这种给予艺术家以创作冲动的内心驱力无疑也将不自觉地流露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达·芬奇笔下那种给人以最强烈印象却又使人百思不解的微笑其奥秘正在于此：“那种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浮现在他母亲的唇际，利奥纳多原已长期处于一种压抑之中，无法再期望从女人的嘴唇上得到这样的爱抚……因此，他努力用画笔再现这个微笑，把这个微笑画进所有的画中”（引自《利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

的一个记忆》)。

弗洛伊德的结论的确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这篇著作发表以后立即引来了众多批评。这些批评比较集中地指责弗洛伊德援用的利奥纳多传记资料缺乏可靠性，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错误（例如在他援用的德文译本资料中“鸢”被译为“秃鹰”）。然而，这些批评却没能减弱心理史学家们研究传记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的《利奥纳多》一文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提供的结论是否有效，而是在于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否可行。显然，弗洛伊德的方法意义在于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乱散见的历史痕迹表现出来，因而分析家们只要象考古学家那样把这些散乱的碎片收集、拼凑起来，就可能恢复历史面貌，“不论这件或者那件，在重构时，都有不容争辩的权利作为补充部分加入进去，并在各种痕迹之间建立联系”（弗洛伊德：《分析过程中的构想》）。

大卫·斯坦纳德的《退缩的历史》一书正是针对上述情况而在结构上作了独具匠心的安排。在第一章“达·芬奇的教训”中，作者巨细靡遗地罗列了《利奥纳多》一文中几乎全部问题并逐一进行了审视和反驳。但作者对心理史学的批判却远未就此告终，相反，仅仅只是以此为开端。正如作者说的



那样：“一部检验象心理史学这种理智事业的书，不能仅仅是一连串象这样的评论的组合。这不但会使此类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还是无效的重复，其论点实际上不过是十分简单而万无一失的批评——受检作品的错误可以通过写出更好的心理史而得以纠正。本书的前提是，有可能是最好的心理史也仍然是糟糕的历史学，这是因为其脆弱的理论根基具有局限性。”

于是，作者在随后各章中，对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精神分析学的疗法有效性问题、逻辑问题、理论问题以及文化圈限问题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试图从根基上彻底摧毁心理史学。尤其是在这些批判中大量涉及了精神分析疗法、无意识心理以及儿童经历对成年人格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心理学界似乎都已有了定论，甚至精神分析学的一般反对者也都视其为该理论中可接受的成分。然而大卫·斯坦纳德却又重新将它们搬上批判的解剖台并予以彻底的否定。这些批判以及为此而援引的大量资料无疑是该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当然，我们为读者提供这个中译本并不意味着译者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心理史学和其他史学理论一样都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其理

论基础的心理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精神分析学，更非仅限于弗洛伊德的古典理论。况且即便是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理论，也还有个理解、认识和发展的问题，过早地宣判他“断子绝孙”显然是不够明智的。例如，对心理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批判是责问：个体心理何以能够说明社会或历史。而史学家们自然也就怀疑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对历史事件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弗洛伊德早就指出“个体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同时是社会心理学”（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和人类“自我”的分析》）。如果说精神分析与以往其他心理学有什么明显不同的诠释理论，那就是精神分析学从来不用猴子、狗或小白鼠作实验来解释人的心理现象；相反，精神分析学在解释个体心理现象时一刻也离不开社会 and 历史的脚注。因此，在弗洛伊德对利奥纳多的研究中，起解释作用的正是达·芬奇的社会经历和生活环境；而在艾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中，他所揭示的心理冲突则更具超越个别人物的特征：路德的身份危机乃是16世纪德意志身份危机的典型；甘地的身份危机也是20世纪印度身份危机的典型（参见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当然，更不必说心理史学著作中还包括了大量对特定历史现象——例如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

本主义等——的社会心理起源研究。因此，在历史领域中机械地区别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并把两者的结合视为一大难题，这事实上正好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们对现代心理学不甚了了，正如一些心理学家们对今天的历史学趋势一知半解一样。而这才正是心理史学发展的真正困难之所在。

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今天却已成了“昨日黄花”。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不是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发迹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克罗齐、柯林伍德、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史学作了反省。当然，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历史学家，但在精神分析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心理史学无疑属于20世纪阵营。尽管这并不表明弗洛伊德如何正确；但至少表明：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代表了当代思想在某些方面的一种共同性。就史学理论而言，精神分析学的渗入表明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已不再停留在满足于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不再把追逐那种“准确可靠的无知”视为历史研究的目的。相反，他们开始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事件的背后，伸向人物和社会的心理层面，并试图代为历史陈述它所不愿或没能叙述的东西。

当然，在这种探索中错误总是难免的，谁都不

可能凭空创造真理。相反，“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特雷弗-罗珀：“历史，内行与外行”）。不过，错误也只有不断地经受批判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渐接近真理。就此而言，大卫·斯坦纳德教授这本《退缩的历史》所提供的批判无疑是有价值的。我们谨希望第一次接触心理史学的读者，不至于因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译本而形成对心理史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冯钢

1988年7月于浙江大学

## 目 录

译序	1
原序	1
第一章 达·芬奇的教训	16
第二章 疗法问题	55
第三章 逻辑问题	82
第四章 理论问题	124
第五章 文化问题	171
第六章 心理史学的破产	209

## 原 序

195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  
斯断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主要区分就在于“它们  
对互补性观点的选择；历史学是就社会生活的有意识  
表现来整理其资料，而人类学则是从诘问社会生  
活的无意识基础入手。”<sup>①</sup>

同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出版物首次明确指  
出：德高望重的学院史学家不久将开始抵制这一自  
明之理。美国史学协会会长颁布了“下一项任务”，  
他倡导协会全体会员着手研究和分析过去社会生活  
的无意识基础。<sup>②</sup>威廉·L·郎格认为这种努力早  
该一试。郎格大度地（尽管只是尝试性地）排除了  
“固有的愚民政策”，即以以前的史学家对精神分析  
——一种打开通向过去的无意识世界大门的工具

<sup>①</sup>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958；纽约：  
基础丛书，1963）第18—19页。——原注

<sup>②</sup>威廉·L·郎格：“下一项任务”，《美国史学评论》第63期  
（1958）第283—304页。——原注

——保持缄默态度的根源，他宁愿认为这种慎重之举仅出于害怕精神分析“冷酷无情、无孔不入的结石”也许会影响史学诠释的人本主义传统。而一些顽固的史学家（郎格会说，这些人“深陷于自己的保守主义之中”）则宁愿将他们所谓的羞怯归咎于精神分析固有的、语义上的蒙昧主义（就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而言）。

但这关系不大。历史学，至少在美国，自那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在郎格强硬地宣称史学著述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的几年之后，另一位知名会员出于一时冲动，竟然主张把个体精神分析作为初出茅庐的学院史学家专业培训的一部分。当托·斯坦亚特·休斯顿感到“纯精神分析”也许无此必要，或许根本不可能时，他写道，在多数情况下，“或许正应作此倡导，并且，我希望协会基金资助这类冒险的尝试”。他接着说：

“我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小批举足轻重的年轻史学家，尤其是那些特别关心史学诠释的心理因素的学者，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进行个体分析。至于其他学者，或许可以制订一个略小的计划，去我国一些主要大学附近

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咨询<sup>①</sup>。”

然而迄今为止，休斯的希望仍未实现。至少，分析并未普遍成为历史学研究生的正式课程。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中，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未成为诸如自封为心理史学家的范·M·勃罗第所说的心理史“外科手术”的对象。<sup>②</sup>几乎没有一个专业协会会议未开上起码的一、二次会议，讨论心理史学进程中的最新发展。目前，至少有两家在发行中的学术期刊，其唯一宗旨便是普及和研讨心理史学分析。<sup>③</sup>

这种性质的研究包括了从艾里克·H·艾里克森文笔优美而见解敏锐的著作直至那些不计其数、毋须提及的学者所撰写的文笔花哨而不切实际的学术论文。但有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给后一组学者的研究

<sup>①</sup>H·斯图亚特·休斯：《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史学》（纽约：哈泼出版社，1964），第85页。——原注

<sup>②</sup>范·M·勃罗第：“谁为废奴主义者辩护”，《反奴隶制的先锋：废奴主义者新论》，马丁·郝伯曼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第68页。勃罗第在此引用了大卫·唐纳德的著作。她称此人挥舞起“灵敏的手术刀”，“巧妙地剖开了主人公的某些阳痿症状和潜在的同性恋，而读者却几乎都未察觉到自己是在目睹一次外科手术。”——原注

<sup>③</sup>应该指明，这些杂志分别是《心理史学杂志》（原《童年史季刊》）和《心理史学评论》。后一种杂志较为严肃、负责和明智，更具有自我批评性。——原注



增辉不少。

《心理史学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劳埃德·德·莫斯，在对战争心理分析含义的见解中提到了“发现时刻”背后的根源，他承认史学和精神分析的“技术培训”对他不无益处（虽然他并未受过史学的“技术培训”），因为他“必须知道如何才能在两个领域的学术文献内得心应手”，然而，他接着说：

“更为紧要的是……在我从事个体精神分析的第七或第八年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努力去重新体验和发现自己被漩流淹没的梦的含意，那时我儿子才两岁，在几百个小时里，我和他一起，装作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钻进被窝，在黑暗中爬来滚去；装作从床上摔下来，大叫：“救命！救救我！”因为这百玩不厌的游戏似乎能给他一种强烈的支配快感。”<sup>①</sup>

幸亏有这类事情，德·莫斯才受到启发，发现战争不过是出生经历的重演。然而，真正的突破是他发现军乐队的节奏类似“产妇子宫收缩时欣欣的

<sup>①</sup>劳埃德·德·莫斯：“心理史学的独立性”，《新心理史学》，德·莫斯主编（纽约：心理史出版社，1975），第22—23页。

——原注